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6辑

种族论中的犹太人话语实践

——试论科学时代下的自我身份管理

张程业*

本文通过梳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犹太人参与种族论的话语实践的历史，展现了在“大写同一性”死亡的科学时代中，犹太人通过知识学的寻源探流来建立新的身份认同的图景。犹太语言问题的提出，意味着传统犹太教所担保的犹太共同体不具备身份交往的可能性，因此犹太人逐渐被视为“没有语言的民族”，而科学话语出现使犹太人形成了新的话语共同体，从此围绕“犹太种族”的身份问题发生了一系列的知识探索，在发展历程上次第集中于三个知识门类：人类学、病理学与现代性。首先，在人类学视域中，犹太学者通过物理体征的测量和观看之道建立了全景敞视的犹太身体和种族；其次，在病理学和生命数据中，犹太知识分子描绘了犹太人“史无前例的生命韧度”这一生理神话，并将犹太的苦难史与社会进化论结合起来，赋予了犹太人优越的身份特性；最后，在犹太人与现代社会的关系中，特殊种类的疾病与犯罪成了文明的表征。犹太学者越来越反对纯粹客观和堆砌事实的研究，而要求回答关于犹太民族的历史贡献和未来建国之路这样的价值和文化问题。

在经典反犹主义理论中，种族论作为犹太人的绝对反题，被视为反犹主义者所操纵掌握的“伪科学”和“假学术”而遭到了知识界的批判和道德上的谴责。种族论最早是一门对人群进行分门别类、寻源探流的知识形式，经过20世纪的历史动荡与社会变迁，逐渐变成一种炮制种族优越论和实施种族屠杀的工具。这

* 张程业，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犹太思想史。

既是事实,却也不是事实的全部。[①]

一个“反常”的现象逐渐进入我们的视野:恰恰是在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如同在普通应用技术和自然科学研究上投入的大量心血,犹太知识分子对种族论的知识话语和自身认知方式有着异乎寻常的思想热情。这与在大解放之后西欧犹太中产阶级的同化过程激流猛进而同化的犹太人却越发疏离于传统的犹太教和犹太伦理这一历史现象密不可分。犹太教和犹太伦理的神圣性已经不能成为新的历史形势下犹太人自身身份同一性的担保,新的世俗时代下的犹太人需要从历史的探源活动中区别自身与他者,给予自己一个可供在与邻居交往中流通的身份,这就是为何此时种族论越来越被视之为走出“犹太问题”这一米诺斯迷宫的关键钥匙。在此,种族论并未一定导向种族主义。在当时犹太知识分子的心中,种族论首先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活动空间:一个可以容纳多种知识学进行“起源探索”活动的学术场域。

正如米歇尔·哈特所指出的,将衍生自种族论的知识一概排斥为“伪科学”和“假学术”,恰恰无益于我们理解何以如此数量众多、遍居欧洲的犹太知识阶层在一个漫长的时间段内对种族话语的全面拥抱。本文即是通过探索在特殊的“科学时代”中,犹太人如何使用各种知识学手段从事话语实践和自我身份勘探,以此重新认识犹太人管理自身身份的历史进程。这一历史进程在科学知识的“进化论谱系”中依次表现为犹太语言问题、人类学、病理学以及“犹太人与现代性”等四个人类知识方面,本文就是按照这种科学知识建构在时间中的演变,尝试回答哈特提出的三个疑问:(1)通过参与种族思想犹太人获得了什么?(2)为什么“犹太种族”这样的提法对犹太人魅力重重?(3)将犹太人打造成一个种族,犹太人有什么意图?[②]

① 徐新教授在《反犹主义:历史与现状》中认为,犹太文化中包含着一种彻底反种族论的传统,种族论是犹太文化中天然的反题,并将种族论视之为德国人树立雅利安人优越地位、迫害犹太人的工具(参见徐新:《反犹主义:历史与现状》,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20~227页)。这种理解一方面明显与犹太人在种族论中丰富的话语实践背道而驰,另一方面过度从敌犹太人的角度来理解种族论,从而使之与历史上犹太人眼中的种族论(而非敌犹太人的种族论)方枘圆凿。David Berger在回顾反犹主义史时,曾提到犹太人毫不犹豫地将某些特殊物理特征归结于犹太种族的存在,但在反犹主义史的研究回顾里,这种犹太人主动的话语实践似乎和以作为被迫害者和受害人的犹太人为取向的反犹主义史不相一致。参见David Berger, *History and Hate: The Dimensions of Anti-Semitism*, Philadelphia/NewYork/Jerusalem: The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1997, p. 11.

② 参见Mitchell B. Hart为*Jews and Race*一书写的前言, Waltham: Brandeis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xvi, xvii.

一、犹太语言问题与科学话语共同体的形成

19世纪下半叶,随着语言民族主义以及生物学种族主义带来的同一性思维大行其道,语言成了族群或者说族裔相互间认同的核心要素。但是这里的语言,正如霍布斯鲍姆所指出的,其"沟通与文化意义是无关紧要的",即语言的意识形态之需大于文化沟通。[①] 但是,进一步说来,一个群体有着可以相互沟通的物质性声音(信息传递)或者说有着相互共属的文化记忆(文本),并不等同于就存在一个公认的能够代表其自身身份认同和向他者表达其存在经验的"语言"。犹太语言问题,不是在处理犹太语言文字的字母拼法、发音规则、语法机制、书写实践,或者民族主义视域中启蒙教育、公民资格乃至意识形态的过程中诞生的;而是在涉及共同体内部及之间的存在经验和思想观念的表达时产生的。语言是一个共同体经验的表达问题,而犹太语言问题所涉及的难题就是:新型犹太人疏离于传统犹太生活,但在西欧民族文化这一共同体之前却不得其门而入。[②] 夹在两者之间的犹太人成为一个没有"共同体经验",因此也就"没有语言"的民族。

瓦格纳最早揭示了犹太人的优异的语言学习能力中的痼疾:这种流利言说多种语言的能力是犹太人与旧的历史生活和其他民族疏离的征候。在1860年写的《音乐里人的犹太人》里,他说:"一代又一代的犹太人操持着他世居于中的民族的语言,但却总是像一外乡人那样说话。""外乡人"就深刻表达了犹太人的存在境遇:疏离、陌异,甚至有时是威胁性的。一方面,对于瓦格纳来说,语言是具有艺术创造性的民族的证明;语言不是四分五裂的碎片黏合成的单位的作品,而是一个历史的共同体(historical community)的成就。而在欧洲艺术与文明一体化的进程中犹太人总是处在四分五裂的状态,因此犹太人就成了全部欧洲的"蛮貊之音"(foreign tongue)。另一方面,他痛斥背离犹太教而改宗的行径,但值得注意的是瓦格纳不是站在基督教立场上对民族国家中存在的犹太人"双重

① 参见[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3年版,第106～109页。

② 著名的犹太学者肖勒姆曾经记述了他的三哥、著名的犹太共产主义者维尔纳·肖勒姆的一个极端事例:"我跟着他参加了一次群众集会,他在集会上发了言,我环顾四周,注意仔细倾听。三哥鼓动群众的能力真不赖。'你别以为,'我告诉他,'他们为你的发言鼓掌,下次选举就一定投你的票选你做议员(这就是他的抱负)。实际上你在他们心里还是你原来的形象。''那个犹太人'(不是'那位同志'!)讲话真是有水平'。我听到一位工人对他的同事这样说。"([以]格舒姆·索罗姆:《从柏林到耶路撒冷》,吴勇立译,漓江出版社2016年版,第158页)哪怕是在最不讲究身份性的共产主义工人运动中,犹太人的身份仍然是工友们脑子里浮出的第一个标签——一个排斥性的标签。

忠诚”有着疑虑,而是认为有如此操行的犹太人使自己陷入一彻底的孤立状态,意味着脱离了由漫长的痛苦折磨而凝聚成的民族共同体,这就使他成为一切生物中最冷酷无情而无所牵挂的存在。[①] 如果说公民身份是可以一夜获得的东西,那么共同体身份的获得却要艰难得多。在 1865 年写的《是什么德国?》和 1881 年写的《宗教与艺术附注》里,瓦格纳进一步将语言的表达与共同体经验和语言的本真性联系起来,犹太民族的语言问题就是处在一个虚无共同体中的社会群体在表达存在经验上的积贫积弱。

无力表达只是犹太语言问题的症候,但要诊断这一痼疾,就需要确切的知识学探索。19 世纪医学的权威泰斗,弗洛伊德的老师 Theodor Billroth 通过观察自己的犹太学生建立起一套种族语言学。他在 1876 年出版的《论德国大学中医学的教学与研究》中称只具有词典知识的犹太人为“博学的白痴”(idiot savant):“他们通常只能理解零丁碎片的德语,这让他们既领会不了语言也搞不懂问题的意义,无论是用德语还是其他方言,面对表达自己的思想这一任务他们都无能为力。”[②]这里的表达不是意指信息的沟通和交换这样的东西,而是存在经验和共同体经验的表达。

但是,问题的吊诡就在于:如果当下的犹太人被视之为没有共同体的群体,那么不就意味着不可能存在这样的经验吗?共同体与共同经验,如今打成了一个死结。症结依然是:当下现代社会里的犹太人除了犹太教到底有没有自己的共同体身份。既然这个身份无法在当下存在中取得,也不可能寄希望于未来,那么历史将会是犹太人仅存的时间维度。为了当下存在,犹太人带着字典与铲子走向了历史。

于是,被逼到死胡同中的犹太人带着科学的器具,将眼光投向了“历史和起源”这样的问题。如果我们理解为何语言问题会以“表达”为中介蜕变成为对起源的历史性和存在的身份性的探寻,我们就能领会作为一种新的知识型构造的历史语言学为何会和作为对人群进行分门别类、寻源探流的种族论知识产生勾连:语言问题,既是一个历史问题、起源问题,也直接承担着对种族问题的回答——只有通过历史探源才能说明共同体的存在正当性。而且对此必须优先通

① Richard Wagner, “Jewry in Music,” Paul Mendes-Flohr, *The Jew in the Modern World*, pp. 302-305.

② Sander L. Gilman, *Jewish Self-Hatred: Anti-Semitism and the Hidden Language of the Jews*, London: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p. 216.

过科学知识学予以解答。[①]

对分析哲学和科学语言心理学贡献重大的 Fritz Mauthner 在自传中说道："我生来就是犹太人，但对犹太宗教和伦理，可谓一无所知。作为一个德国小孩充其量可说我小时候听到了犹太式的话语以及 maucheln 的表达。"[②]充当了"生来就是"和"一无所知"之间的桥梁并允诺其某种可追溯的身份皈依和自我起源的，就是犹太话语的"语言身份性"(linguistic identity)，这也是为何 Mauthner 倾其一生解答语言这一谜团的原因。

犹太人为何倾向于通过科学知识学来解答身份之谜？确切说来，为何是种族论？

首先，这可能意味其他能够确立身份性的话语在德国是无效的。法国式的启蒙主义话语和英国的自由主义话语，在未经历民主政治革新的德国都举步维艰，大家逐渐意识到理性是不能消除敌意和憎恶的。[③] 戈德斯坦的一段话最能表达这种挫败感："即使所有的污蔑都反驳了，所有的歪曲都纠正了，所有的错误判断都拒斥了，恶意仍是不可推翻的。凡是意识不到这一点的都是无可救药。"[④]

其次，围绕科学知识学所建立起来的实证性体系能在最大程度上消除原本

① 福柯已经指出："现代思想彻底地献身于返回的重大关注，献身于开始的关切，献身于这个奇异的原地(sur place)焦虑，这个焦虑使现代思想有义务去重述重复"，"现代思想就努力重新发现处于同一性(笔者按：也可以理解为身份性)之中的人，即处于这个完满之中，或处于认识人自身这个虚无当中，重新发现处于这样重复中的历史和时间"。([法]米歇尔·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的考古学》，莫伟民译，上海三联书店 2016 年版，第 338、339 页)上帝这个"绝对同一性"(大同一性)对一切类群的绝对担保的崩溃造成了分崩离析的各个群体"重新发现"了"身份性"(小同一性)存在，因此，种族、历史、语言都成了通过探向历史和时间这个深渊来取的完满充实的身份性的可能路径。种族论的冲动和扩散即起源于这种需要。(种族论的发生背景请见[法]皮埃尔-安德烈·塔吉耶夫：《种族主义源流》，高凌翰译，三联书店 2005 年版，第 7～9 页)

② Sander L. Gilman, *Jewish Self-Hatred: Anti-Semitism and the Hidden Language of the Jews*, London: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p. 228.

③ 对不可还原的敌意的自我意识，与否认这种恶意的自我欺骗，实际上构成了犹太人的现代意识处境的两个基本面向。肖勒姆对犹太人的"自我欺骗"有一段极为经典的描述："对自我欺骗的发现是我青少年时代最重要的经历之一。多数犹太人对一切事关他们自身的事情毫无判断，而涉及其他现象的时候，他们的理性、批评和远见等各种能力就别发动起来了，对于这样的能力人们没有理由不惊叹或批评——这种自我欺骗的能力也是德意志—犹太关系下最重要、最令人沮丧的方面。"肖勒姆由此批判他的同化同胞："我这里所谈的哪个广大阶层，以及他们精神和政治上的代表都愿意相信归化、融入到那个大环境中去，他们总体上对这个大环境是无所用心的，到后来甚至有一点欢迎的态度。"([以]格舒姆·索罗姆：《从柏林到耶路撒冷》，第 28、29 页)这一对大环境无所用心的悲剧之巅峰：他们费尽千辛万苦点燃起来用以驱寒的火苗最终被虎视眈眈的敌人篡夺，他们最终焚身于自己参与撩拨起来的火苗之中。

④ 转引自汉娜·阿伦特为本雅明文集写的前言。[德]汉娜·阿伦特编：《启迪：本雅明文选》，张旭东、王斑译，三联书店 2012 年版，第 49 页。

问题话语的模糊性和游移性。科学要求精确性，由精确性建立的客观性将会是对暧昧之意见的致命一击。这就要提到，在不存在自由主义式的契约共同体和启蒙主义式的公民共同体而只有“民族共同体”的德国[①]，却存在另一种高涨的共同体热情——科学知识学共同体。在彼时，犹太知识分子是一切科学知识学最热衷的参与者、建构者和宣传者。在今天，历史语言学、种族心理学、地理人类学、犯罪学、生物统计学、疾病分类学已渐成奇涩古董，优生学、面相骨相学、体质人类学、历史种族学、犯罪学是地地道道的神棍科学，而社会学、人类学、统计学、病理学却俨然社会科学之正宗：在以上所有学科的生住异灭的光影流动中，都有犹太学者的身姿。阿伦特曾经对“犹太人问题”的死亡表示担忧[②]，我们今天应该同样不能忘记：将犹太人问题从无穷无尽、暧昧不已、没有曙光的宗教、伦理和形上学旋涡中拯救出来，使身份争执有获得结论的可能，有通过一种可计算性的理性加以精确衡量的，是科学的修辞。[③]

再次，犹太人将自身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将科学研究的范式内在化，既是在科学活动实践层面树立了其自身的科学家主体地位，同时犹太人作为研究对象的这一存在地位也在客体层面将差异的存在予以合法化：科学样本的合理存在。吉尔曼一针见血地指出，科学知识在量上的爆炸性增长和类上的失控繁殖给犹太人处境带来的转机：科学研究依赖的是主—客体、科学家—样本这样的二歧式，科学知识一旦与确立他者—自我划分这样的种族研究范式结合起来，就确立了作为他者的差异的合法性，即差异是作为客体的绝对的存在。同时，19 世纪晚期的犹太人生产了大量的生物性语言的概念变式，这就牢固确立了犹太人作为科学家的主体地位，而非样本和客体。正如 Mitchell B. Hart 所说：“犹太人对被卷入其中的种族想象的运用发生了重大转变：重新定义能动性(agency)——在其中客体同时变为主体和分析的客体。”[④]在此基础上，吉尔曼重新标定了迈尔发明“anti-semitism”(反犹主义)一词这一行径的历史坐标：这不仅仅是反犹主义的词汇学上的学理开端，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位受洗的犹太人之子迈尔，新的科学与人类多基因起源的概念的语言，进入了犹太人特殊语言的理念中”，“一门种族主义的新的科学，是犹太人独特与隐藏的语言”[⑤]。

① [美]克劳斯·P. 费舍尔：《强迫症的历史：德国人的犹太恐惧症与大屠杀》，佘江涛译，译林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73、76 页。

② [德]汉娜·阿伦特编：《启迪：本雅明文选》，第 48 页。

③ Hilary Putnam, *Reason, Truth,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185

④ Mitchell B. Hart 为 *Jews and Race* 一书写的前言，Waltham: Brandeis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xx.

⑤ Sander L. Gilman, *Jewish Self-Hatred: Anti-Semitism and the Hidden Language of the Jews*, London: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pp. 212-213.

最后，我们要注意：犹太人热衷于通过“犹太种族”来追寻“犹太性”意味着什么？在传统的反犹主义研究中，是敌犹太者而非犹太人自己对“犹太性”这一斯芬克斯之谜迷狂不已。而在19世纪是犹太人需要主动“了解”和“形成”自身的身份并在与他者的交往中进行宣说，以诊治“现代性身份失衡”之病症。在此，我们看到的不是反犹主义建构的“他者中的他者”的形象，即要理解作为他者的敌犹太人怎么观解、思考、构型、谋害作为其（即非犹太人）他者的犹太人，在其中，犹太人总是作为受害者、客体、沉默者、敌犹太人的受害者来论述的；而是“自身中的他者”的形象——犹太人通过科学知识的体系将自身作为自身的他者来观解，其作为言说者，观审者，科学构建者，同时也作为言说对象、标本、科学的支撑物，成就了其独特的话语实践。

二、全景敞视的犹太人

霍塞利兹曾经说：“种族理论本质上是一种‘浪漫’的理论。”[①]放到犹太人的种族论话语实践中，这句话却经不住推敲。种族理论本质上是一种实证、科学且冷酷的现代性科学征候，通过测量性和数据性空间所打开的是规范性的视域。其中，人类学是犹太人最早用来从事科学活动的知识手段，但是这里人类学不同于1920～1930年形成的通过田野调查而进行的对人类群体的文化实践的研究，而是以数据统计和体征描述为主体的对起源和分类进行研究的学术活动。

在由约瑟夫·雅各布主持编纂、出版于1901年的《犹太百科全书》中，“人类学”是被如此定义的：“人的科学，特别是对他的物理方面，也包括由气候和社会环境等所决定的方面的研究。”人类学的核心问题是：在人类不同群体层面所观察到的相似性当被归因为“自然”（nature）还是“育养”（nurture）。犹太人类学的核心问题就是：如果承认犹太人是一个种族，那么探索的重点就是由社会环境所形成的群体性差异；如果不承认这一点，那就要解释在不同气候条件下生存的犹太人为何存在显著的相似性。[②] 这样的定义在今天看来本身就十分有趣：人类学不断地在相似性和差异性之间摇摆。承认同一性，就需要解释差异性；否认同一性，就要解释相似性。可见，以“犹太种族”这样的大写同一性为支点，相似性与差异性就像跷跷板的两端，随着研究者侧重点的不同而发生摇摆。

这样的人类学探究一般分为五个主要话题：(1)种族的纯洁性；(2)人体测量

① ［德］维尔纳·桑巴特：《犹太人与现代资本主义》，艾仁贵译，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11页。

② *Jews and Race*, Waltham: Brandeis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53. 本文所引用的米歇尔·哈特所编辑的这部文献集皆据此版本，以下不再一一注明。

学(anthropometry);(3)生命数据(biostatics);(4)发病率;(5)社会状况。我们将逐一讨论这些问题。

种族的纯洁程度可以在两个向度上得到理解:一方面,是历史上犹太人长期的隔绝状态与群体居住习惯,这使犹太人被动地成为自我保持同一的天然样本;但这样的历史向度解释面临着"通婚"和"改宗"这两种现象的挑战——在何种意义上,犹太人与非犹太人的通婚以及蛮族群体的改宗打破或保持了犹太人的种族纯洁性?[①] 另一方面,纯洁性意味着物理体征上的同一性,具体说来,争论最多的就是犹太人的发色问题(黑—金)和头颅特征(宽—窄)问题。[②]

通过人体测量学得到的发色、肤色与头颅特征数据,被视之为历史与起源中共同祖先的生物馈赠和遗迹残留,从而成为解答犹太种族问题之谜的最佳入手:这就构成了犹太人类学的基本认识型布局,以及独具特色的杂糅生物性、数据性和历史性的术语体系。我们可以在 Rudolphi 的阐释中窥见当时的知识心态:"尽管寓居于不同的地方,但是犹太人的面貌和头骨却保持了其独一无二的特征。布卢门巴赫在其著作中将这一点完美地表现了出来:一个五岁的小姑娘的头骨,和一个上百年的男人的头骨,都是犹太人的。乍一看,他们的犹太性满目皆是。犹太特征不仅在其外部和软组织上留下印记,它甚至标识了其骨骼结构。"[③]通过将人体的生物存在划分为几个可以被严格测量的基本空间,肤色、发色、面貌和头骨就成了"犹太性"可被读取和记录的数据库。犹太性不同于犹太种族这样的绝对同一性,犹太性是一种福柯意义上的"有限性":只有通过实证的数据测量,我们才能从历史中发现祖先与"我"都具有的特点,才能建构起关于犹太人的基本知识[④];而乍看上去的相似性,只不过是辅助了数据结果的成立。

于是我们可以说,犹太人类学就是通过将犹太人器官化、肉身化和生物化而

① 关于改宗和通婚问题的数据学(即何者在数据上具有更能支持犹太种族存在的精确性)争论,见 Arthur Ruppin 的 *The Mixed Marriage*, pp. 170-173.

② Goldatein, "Introduction to the Antropological Study of the Jews," p. 43.

③ Goldatein, "Introduction to the Antropological Study of the Jews," p. 46.

④ 福柯在《词与物》中论述了实证知识如何建构人本身:"人的知识把它们作为外在于人本人而揭示给人。"有限性指的是人本身,但人本身的知识却是处于其自身之外而揭示给他。这样子,有限性就处于一个"无休止的自身参照"。([法]米歇尔·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的考古学》,第 316～322 页)身体内在于我,而身体的知识外在于我,内在于我的身体需要外在于我的身体知识获得对自己的认知:这就是认知的怪圈。犹太性就这样被无穷无尽的关于骨骼、头骨、软组织、身体发肤的知识所淹没,却永远不会被彻底淹没。

实现的对犹太人自身的全景敞视,即对身体的重新观看。[①] 我们的身体是一座桥梁,沟通了渺不可知的历史云深处和当下生存的合法性。全景敞视意味着身体的器官化,分裂成不同的差异性器官以用于测量,所得到的数据就构成了"种族"这一大写总体性。破碎的可测量性身体,被组合在一起的器官,不断制造细微差异的观看,最终被抟合在一起的"种族"——构成了全景敞视。

这里,我们需要澄清的一点就是:这里的全景敞视的犹太人与传统在民俗文化和知识阶层中流行的犹太人形象的区别。罗圈腿,鹰钩鼻,薄嘴唇,身材短小,佝偻腰背展现的是一幅讽刺漫画,外貌是被漫画化、讽刺化乃至妖魔化的。[②] 其基础是彻底的偏见与诋毁,因此,真正的犹太肉身反而得到遮蔽与持存,成为某种可被保留以作反驳之用的实体资本("看一下你的犹太邻人吧! 你就会发现他不是那样")。

但是,作为科学样本的犹太身体难道和显微镜下细胞有什么不同吗? 科学对象就因此被赋予了科学研究程序所具有的客观性、全面性和合法性。这种操盘的基础是对身体的透视,身体就是身体那些可以被划分的基本区域,是测量的数据,身体自身不隐藏任何东西,因为一切距离的阻隔都逃不出犹太人手中的尺子。身体透明了一切,唯独遮蔽了自己。

因此,和吉尔曼认为当时的学者和流行作家将犹太身体作为一个纯粹幻想的客体不同[③],哈特认为在种族论的知识型中进行自己的科学研究以对抗种族反犹主义,回应错误形象,不仅是犹太人,也是很多美国人和美国黑人的常用手段。而《犹太人的人口统计与数据期刊》这份统计数据期刊就积极地体现了犹太人全景敞视的成就。

这样的身体区域分节应该追溯到 1758 年瑞典的自然学家林奈在《自然体系》中提出关于人种的六种划分,并且系之以相应的生理、物理、心理表征。人种问题的提出要求对人的相貌的重新观看,相应器官的数据有机结合在一起就成就了作为一个独特种类的群体。因此,头发、鼻子、眼睛、头骨、身高、身形、四肢比例,其各自的测量结果组合在一起就成了关于人种及其种族的科学知识。

① 尽管笔者从福柯那里采纳了"全景敞视"这个术语,但是这里并不涉及在固定建筑空间中权力技术在分割的视域内对人的监视,不是为了在"被囚禁者身上造成一种有意识的和持续的课件状态,从而确保权力自动地发挥作用",这里也没有"一种虚构的关系自动地产生出一种真实的征服"——换言之,这里不是监狱,而是一种社会性的学术场域中的"身体"。笔者化用了《规训与惩罚》中的术语,来处理一个《词与物》的问题式:如何发明对身体的观看之道? (参见[法]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刘北成、杨远婴译,三联书店 1999 年版,第 219～227 页)

② 参见徐新:《反犹主义:历史与现状》,人民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04～114 页

③ Sander L. Gilman, *The Jew's Body*, New York: Routledge, 2011.

头骨的形状、重量、周长是犹太统计学家尤为关注的部分。正如 Richard Weinberg 所说:“到目前为止,没有哪个身体器官比大脑更能充当人类历史的出生地、艺术的摇篮、身体与灵魂交欢的玄妙婚房,这一点完全正确。”头骨的大小在这里被视为和大脑的发展程度相关。[①] Samuel Weissenberg 对犹太人的头骨是如此痴迷,为了打破朱迪关于阿什肯纳兹人和塞法迪人之间不存在差别的论断,他跑到莫斯科的人类学博物馆调查和测量出土于土耳其 Sliwno 和 Yamboil 的头骨,就是为了研究头骨的长、短、扁、圆,以此说明人种的差异和历史流变。他的结论是,古代以色列人只有一种长头颅(dolichocephalic skulls),随着与高加索人和阿尔卑斯低于欧洲人的交往,产生了短头颅(brachycephalic skulls),这正好与犹太人的两种主要分支——塞法迪人和阿什肯纳兹人相应和。[②]

犹太人在如何解释这些数据和测量结果的时候表现出极大的弹性,或者说分歧。西格蒙德·菲斯特就认为这两种物理形象不过是个体的生存环境所造成的结果,根本不是先天犹太性的表征。一个犹太学者的面部特征与一个处于社会底层的犹太人相比,可能反而会和一个和他处于同一阶级的日本人更相似。犹太相貌(Jewish face)是推导不出犹太种族(Jewish race)的。[③] 进一步说,犹太的身体存在(Jewish corporeal being)不等同于犹太人意识(Jewish consciousness)。[④] 菲利克斯·泰勒哈勃说社会和宗教—卫生实践可能更加易于给人们视之为种族特性的东西打上烙印,这些都是获得性而非先天性遗传。[⑤] 还有一种更为机巧的反驳,用来应对否认存在犹太种族的说法:倘若不存在犹太种族,那么犹太人类学家想要测量所谓的“犹太特征”,本身不就是自相矛盾的吗?[⑥] 但是,如下的说法更加常见:即使我们在犹太宗族和犹太特性的问题上留一个尾巴,难道我们就不知道什么是一个犹太人了吗?

这里的困难可能就在于:由于当时知识分子意识到犹太种族这样说法的危险性,便越来越倾向于否认存在一犹太种族,但是作为身份性的犹太问题仍然没有减轻自己压在犹太心灵上的重量。

① Richard Weinberg,“The Brain Weight of Jews,”pp. 71-75.
② Samuel Weissenburg,“The Jewish Racial Problem,”pp. 79-80.
③ Sigmund Feist,“Are the Jews a Race?”p. 90.
④ Chain Zhitlowsky,“Jews and Jewishness,”p. 263.
⑤ Felix Theilhaber,“Contribution to the Jewish Racial,”p. 116.
⑥ Sigmund Feist,“Are the Jews a Race?,”p. 88.

三、病理学中的犹太人

通过人类学所全景敞视的犹太身体的物理体征，来建立关于犹太种族历史和现状的知识，这在19世纪末逐渐被视之为一种落后且极具危险的知识学方法。在深入起源和历史以管理自我身份的同时，以犹太种族这样的大写同一性为支点，体征描述只能在相似性和差异性之间摇摆不定，而不能彻底解决问题。这是因为一切犹太身体的数据都是通过指向历史和起源问题，才迂回到犹太种族这一问题上的。而生命数据(biostatics)和病理学的出现，以作为一种社会存在的犹太身体为支点，直接指涉当下犹太人的存在状况与身份，与彼时出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相配合，更能完成犹太知识分子身份管理的目标。

在1891年，还未到纽约编纂《犹太百科全书》的约瑟夫·雅各布就认为犹太种族的纯洁性不能通过人类学测量手段来获得证明，因为犹太身体在物理上常常变化急剧。[①] 菲利克斯·泰勒哈勃是著名的物理学家、性学家、种族科学家以及犹太复国主义者，他在1910年就写道："此外，认为头颅测量或其他相关的形形色色人类学的调查能够充分澄清种族问题，也是一种谬误的想象。今日，犹太人在某种意义上是否在种族上代表了一种单一的实体，人类学绝不能如病理学，或者这么说，疾病分类学(疾病的知识)所能决定的那么多……如果我要用一句格言说明它，那绝不会是'让我们远离人类学'——这恰恰是最近很为突出的一点——而是，我仅仅力图呼吁建立另一门科学学科的基础，我将称其为'犹太病理学'。"[②]

新的病理学首先是一门对生命发展的各个阶段状况以及与之相匹配的疾病进行统计的生命数据库，在文本形式上通常呈现为诸多表格的编排和数字的垂直排列，表格之后的文字不过是对表格基本数据的陈述，以及通过社会学手段进行的结果澄清。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无意对这些统计数据进行再分析，而是指出这样的知识学和文本布局如何建构了关于犹太身体的新的知识，统计者如何将自己对犹太身份的理解潜移默化地转移到表格的设计之中。

首先是关于生命发展阶段的数据，包括出生率、死亡率、代际代谢率(男性结婚的平均年龄＋1＋女性生育年限的一半)、结婚率、女性月经期、男女比例、平均寿命、死亡率、婴儿死亡率等。这样的统计数据大多以人种为对比单位，于是，我们可以看到犹太人的身份特性逐渐通过生命的阶段发展而被展现出来，而大多

① Joseph Jacobs, "Racial Characteristics of Modern Jews," p. 10.

② Felix Theilhaber, "Contribution to the Jewish Racial," p. 121.

数统计结果都可以通过社会学的调查而得到解释。与人类学通过测量的描述结果来证明犹太种族的存在或不存在不同,在一切的生命数据统计之初,就必须设定存在作为整体的“犹太人”,这样的整体以自身生命出生入死而被勾勒。

其次,犹太人经常统计的一项生命数据是:犹太人是不是天然倾向于感染某类疾病。这种“天然倾向”的问题设计无疑或者暗藏恶意或者表达了犹太人自视甚高。笔者检视当时的文献发现,这些疾病可谓五花八门,简单列之如下:

> 糖尿病与精神紊乱(癔症、神经错乱、神经衰弱);
>
> 肺结核、肺炎、肾炎、伤寒、疟疾、流行性疾病、呼吸道和泌尿疾病;
>
> 新陈代谢疾病(即痛风体质与疱疹素体质,具体说来有痛风、胆结石、肾结石、周期性风湿病、某些形式的神经痛与偏头痛、哮喘、肺气肿、静脉曲张、痔疮、动脉硬化,还有一些皮肤病);
>
> 目盲、色盲、近视、沙眼、青光眼。①

但同时,关于犹太人拥有特殊免疫力的传闻也得到了历史和数据的支撑,关于犹太人拥有“史无前例的生命韧度”的说法流传甚广。美国犹太种族学研究的权威莫里斯·菲斯伯格总结了当时广泛存在的这些看法:“Tschudi 在谈到 1364 年那场大瘟疫的时候断言,这一疾病没有影响到任何国家的犹太人。Fracastor 提到了这一事实:1505 年那场流行性斑疹伤寒未伤及犹太人的一根汗毛。Rau 提到这一对斑疹伤寒的免疫力也可以在 1824 年的 Langeons 观察到。Ramazzini 坚持犹太人对 1691 年发生于罗马的间歇性流感拥有同一免疫力。Degner 则说犹太人安然逃避了 1736 年尼麦格发生的流行痢疾病。Michael Levy 则评论道,这种免疫力在同一时代的法国和以色列昭然若揭。”② 我们今天可以知道犹太人的免疫力是现代医学和统计科学合力打造的生理—身体神话,通过唤醒关于犹太人的古老传说并披以数目字的外衣,犹太人免疫力这种数据制造出来的现象就成了历史上早已有之的现象。就这样,历史的记忆苏醒于暗流涌动的科学话语。

生命数据在欧洲的布局呈现典型的星丛状:可供犹太学者进行数据统计的只有处于现代化前沿的大型城市,如伦敦、维也纳、柏林、华沙、布达佩斯、阿姆斯特丹,也包括马萨诸塞、阿尔及尔等非欧地带的现代化区域。这些大城市犹如辽阔夜空中熠熠闪光的明星,也是这样的夜空中唯一的视点。

---

① 资料出自 Maurice Fishberg, “The Comparative Pathology of the Jews,” pp. 97-113; Noel Haltrecht, “The Problem of Tuberculosis among the Jew: A Racial and Socio-Pathological Study”, pp. 137-141.

② Maurice Fishberg, “The Comparative Pathology of the Jews,” p. 101.

现代化城市的发展使得数据科学作为生命政治可预测和可操纵的基石而蓬勃兴起,但却使得空间地理的差异全然泯灭。因此,作为话语中介界面的免疫力—数据学,成功抹除了历史—现实、习见—科学、地理—空间的差异存在,而塑造了犹太人"史无前例的生命韧度"这一"史无前例的生理神话"①。莫里斯·菲斯伯格说:"在阿尔及尔,哪怕犹太人挤在狭隘幽暗的居室——通常是地下室,他们仍然比非犹太人拥有更加强大的对传染性疾病的抵抗力,这一点我们可以清楚地从数据中看到。"②

病理学和生命数据不仅能够直接表现犹太人生理的优越性,更是在犹太人的解释中,配合当时流行的进化论模式,展现了犹太生命韧度产生的机理。病理学的统计数据有两个结果:一是犹太人由于物理上的虚弱而导致的高发病率;二是犹太人所拥有的强免疫力。如何解释在比较病理学的视域中解释这两个"生物统计学"的差异:犹太人缺乏物理和肌肉力量,但是拥有"史无前例的生命韧度"?

我们可以看到,历史的记忆与生物科学话语天然的亲和性,在这里就表现了出来:"被欺凌蹂躏了两千年以后,和他的非犹太人邻居相比,今日的犹太人拥有相对较少的物理和肌肉力量,血液更加稀释,身型更加矮小,胸与肩背更加狭窄。但是抛却所有这些物理虚弱之体征,犹太人还是抗住了不幸,疾病,甚至死亡,正如我们上文所看到的,在这些方面超越于一切其他种族。这一显而易见的矛盾之原因也不难找寻:现代犹太人,不论是物理上还是精神上,都是自然选择、经历了持续两千年适者生存的之后的产物。"③莫里斯·菲斯伯格于 1901 年在《犹太人的比较病理学》中提出的理论,到了 1925 年,仍被 Noel Haltrecht 在《犹太人中的肺结核问题:一项种族与社会—病理学调查》中用来解释犹太人肺结核病的低发病率。

病理学为我们保留了这一几近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停滞时间。

① 然而,数据自身也可以颠覆这样的刻板认知,尤其是通过对进行"史无前例的生命韧度"进行更详尽的数据区分,如区分发病率[和非犹太人相比,犹太人酗酒和得梅毒的数量很少(两者是 15∶1),性病是 3∶1,但是淋病几乎占了一半]与死亡率,区分犹太人免疫力的种类(对结核病、肺病、淋巴结核、痨症、脑水肿的免疫;但更易死于白喉、腹泻、神经系统疾病,尤其是脊髓疾病)。这与其说是数据自身的流动性,不如说这一流动性扎根于研究者先行的意向性。

② Maurice Fishberg,"The Comparative Pathology of the Jews,"p. 101.

③ Maurice Fishberg,"The Comparative Pathology of the Jews,"p. 110.

四、现代性疾病、文化价值与建国之路

实际上，犹太人的病理学并非仅只是将犹太人作为某种疾病的载体或统计现象的附身，随着社会学的发展，或者说随着犹太人更加倾向于用社会环境、宗教—卫生习俗、经济状况等具体要素来解释犹太人与疾病的关系，反犹主义者以种族论为中介的对犹太人的种族缺陷的攻击就很难奏效了。但是，犹太人在解构了存在某种固定不变的犹太性之后，釜底抽薪般地通过达尔文主义塑造了一种关于犹太性的新型解释体系，从而，原本被视之为苦难流浪和压迫歧视的“犹太历史”和“犹太人与资本主义”一道，成为证明犹太人在现代社会理应占有一席之地的坚实理据。和桑巴特式的颂歌类历史写作不同，犹太知识分子通过更加迂回与曲折的道路，使“疾病”这种看似物理上的缺陷与现代性紧紧联系起来。

这种新型话语就是犹太人与现代病的关系。疾病不再是种族落后的体现，而恰恰是文明之表征。我们可以这么说：不是疾病构造了现代犹太人，而是犹太人发明了现代病。某些疾病需要从比较病理学的视域中摘取出来，获得特殊的关注，因为这些疾病是现代文明的增生物。犹太人总是生活在城市中，因此，会格外容易罹患某些城市病。对于犹太知识分子来说，现代城市生活的机理就是通过疾病来纯化自身，获得动力：“确实，想要在现代大城市的贫穷家庭发现他们有可以往上追溯四到六代的城市居民祖先，那真是稀罕之事。城市人口被从乡村来的源源不断的优异、纯净、新鲜的血液之流动所维持，它就抵消了攘攘城市生活中令人委顿的衰退之影响。”糖尿病与精神疾病就是典型的现代性疾病。迪金森医生就认为糖尿病是与某些神经系统故障相联系的，而且糖尿病是一种纯粹的商业疾病。他风趣地说：“对股票交易的担惊受怕制造了糖尿病。”犹太人作为一种都市、现代性和商业生物，必然是现代病的集中者。

疾病与犯罪活动，是现代社会的两个痼疾。只要我们记得，犯罪学的创始人龙勃罗梭是犹太人，我们或许便能理解犹太人对这一领域投入的热情。调查犹太人的犯罪活动、犯罪种类和犯罪原因的学者中，鲁道夫·瓦瑟曼就是一个代表。在他绘制的一个关于犯罪率的图表中，我们发现涉及的犯罪种类主要有两种：刑事罪与商业罪。阻碍司法、轻微身体侵犯、严重身体侵犯、故意破坏财产、盗窃、偷盗林木、扰乱和平等罪名被排列在表格的上半部分，毫无疑问，基督徒的犯罪率远远高于犹太人；诽谤、挪用公款、接受赃款、文件造假、伪造签名、伪证罪等罪名被排列在表格的下半部分，同样符合人们的心理预期的是犹太人的犯罪率高于基督徒。

在解释这一现象时，鲁道夫·瓦瑟曼在方法论上有着格外审慎的思索，在强

调了犯罪与社会阶层的联系后他话锋一转:“然而,其他的因素——也就是一个人的种族构成——没有被卷入到促进个体的犯罪冲动,这绝非明明白白;这也不是在否认在犹太人的情况中,社会状况在某种程度上得追溯到种族特征上去——这一点对谁是不适用的呢?”但是,针对 Roos 的那种“犹太人的犯罪通常说来是其作为犹太种族的自然倾向与其社会经济境况相结合的产物”这种四平八稳、几乎毫无意义的相加论观点,他予以了两方面的批判:“一方面,它没能允许我们辨识出在特殊情况下,个体的原因也总是起效的;另一方面,这样一种阐释形式就把两个非常不同的要素置于同一解释的基准和水平上。”[①]种族论忽略了数据的个体差异,而力图调和“种族”与“个体”的调和论者的解释则因为过于平均化、过于四平八稳而失去了其力图获得的解释力。这一观察是十分具有洞察力的。

对犹太现象的解释往往存在着多种类型的原因,相对于一元论者,混同多种要素的二元论乃至多元论者更为常见。但是鲁道夫·瓦瑟曼在承认现象的多元造成之后,所强调的恰恰是反对将现象的多元论造成等同于多元的均效论。在方法论层面真正相对立的不是环境论—本质论,两者在解释层面大多是相互结合的;而是多元论—均效论——这样的思考十分发人深省。而提出“犹太人与资本主义”这一发人深省问题的桑巴特,在方法论上却极为陈旧。他不仅将犹太现象中的环境论影响说成是犹太特性的结果而非原因,更是进一步推论:犹太特性起源于该种族的天性,而根本不是因为教育的作用。[②]

学界通常认为桑巴特的贡献是按照韦伯的理路提出了“犹太人与资本主义”这一富有启发性的话题[③],但如果我们打开视野就会发现,在一个科学知识学的竞逐时代,即在客观性和事实性所重重包围的世界中,透过前者所规定的问题式而重新提出关于犹太人的价值问题,这才是桑巴特能激发大量犹太学者知识兴趣的核心关键。这也是 20 世纪之后犹太知识探索的新的方向:总结犹太民族的历史文明贡献,在现代政治体制中重新塑造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的犹太国家。

从 20 世纪开始,历史不再仅仅是一个关涉起源和时间的学科,这一崭新的历史逐渐被视之为文化现象和文明活动的集合。文化与价值,成为德国特殊认

① Rudolf Wassermann,“Is the Criminality of the Jews Racial Criminality?”pp. 145-149.

② 参见[德]维尔纳·桑巴特:《犹太人与现代资本主义》,艾仁贵译,上海三联书店 2015 年版,第 13 章。桑巴特的惯用伎俩是称某种习常的现象解析“倒果为因”,但是正如霍塞利兹在该书《序言》中所指出的,缺乏坚实历史实证研究的精神推理才往往惯于“倒果为因”。

③ 莫里斯·菲斯伯格从犹太人的被动性和资本主义自身的发展条件着眼,批判了桑巴特将“犹太人与资本主义”进行起源论追溯的做法。参见 Maurice Fishberg,“Jews, Race, and Environment,” pp. 150-152.

识型环境下思考历史问题的新的坐标轴。卡尔·曼海姆就指出,人们重新把历史、哲学和语言当做文化的具体表现形式,作为真正的生活过程的建构产物而将其统称为“文化现象”。同时,“大写同一性”的解体使得价值危机问题越发严峻,而只有文化才能使漂泊无依的价值有立锥之地。[①] 可以说,历史文化是价值顶点。

在这样的认识活动中,犹太思想家越来越从历史文化的成就这一方面来表现犹太种族。犹太作家和民族主义者 Chaim Zhitlowsky 就认为犹太人对“犹太性”或者说“种族犹太性”(Racial Jewishness)感兴趣主要出自两个原因:一是认识其自身;二是发现每个民族性的种族所实现人类文明财富。两者对于澄清人类进步历史过程中生物学的基本地位是关键性的。[②] 生物学地位是通过历史文化的天平而得到衡量的。如此历史便摆脱了旧的历史语言的枷锁,而成为通过表彰历史文化之成就以突出文化价值的学科,历史现象同时也是价值现象和文化现象。[③] 戏谑地说,历史从“字典”变成了“功劳簿”。我们因此就能理解,20 世纪上半叶为何会有大量的关于犹太民族的历史贡献的著作,而从犹太人类学到历史学这一历史演变,其间转换的恰恰是能够建立犹太身份性和历史性的知识谱系图。

如果说价值与文化是历史问题的双璧,那么犹太人能否拥有一个保证其日常生活和价值创造的政治共同体,就成了一个首要的不可逃避的价值问题。在这里,我们将以戈德斯坦给 Zollshan《种族问题》写的书评为例。在书评中,戈德斯坦对作者单纯追求事实性、客观性而对价值问题视而不见深感不满。Zollshan 清楚地指出了眼下犹太人的存在状况处于严重危机之中,犹太民族自己也可以发现不是被他者推向灭亡的边缘,就是首先从内部解体而失去自我。

① 参见[德]卡尔·曼海姆:《思维的结构》,霍桂桓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4~9 页。

② Chain Zhitlowsky,“Jews and Jewishness,”p. 264.

③ 此种历史进程亦对应于中国“文化史”“国史”写作之兴起。如中国第一部文化史通史著作、柳诒征写于 1919 年的《中国文化史》中所提出的三个问题:“中国文化为何?中国文化何在?中国文化异于印、欧者何在?”他紧接着提出了同时作为“疑难”与“价值”的三个问题:“幅员之广袤”:试问前人所以开拓此天下,抟结此天下者,果何术乎?“种族之复杂”:试问吾国所以容纳此诸族,沟通此诸族者,果何道乎?“年祀之久远”:试问吾国所以开化甚早、历久犹存者,果何故乎?(参见柳诒征:《中国文化史》,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5 页)这三者,既是疑难,也体现了一种存在价值。钱穆在《国史大纲》中区分“历史材料”与“历史智识”,就是将历史与史料学区分开来,同时在“认识”中谋求一种“情感”:“且人类常情,必先‘认识’乃生‘感情’。人最亲者父母,其次兄弟、夫妇乃至朋友。凡其所爱,逼其所知。人惟其所爱而奋斗牺牲。人亦惟爱其所崇重,人亦崇重其所认识与了知。”(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 1991 年版,第 1~2 页)历史、文化、价值、情感往往成为一种错综复杂的结晶体,历史学由此在这个阶段获得了其特殊的面貌。

戈德斯坦认为建立犹太国家将是通过这些科学逻辑和事实材料所能推导出来唯一严格结论,但是这一民族目标和计划能否实现作者却全然避而不谈。戈德斯坦反讽地说,作者似乎对提供一本仅仅材料丰富和事实准确的书感到满意,但是现在人们热衷于写作一种关乎最高的人类权利,即建构价值的书。仅仅提供事实,而不是给出与那些建立德国民族价值的充满敌意的判断的相反判断,不表达任何价值思想,这样的书可以是"对的",但能够保持自己的正确性吗?[①] 逻辑上的"对"无法抵御一种价值上的"你是错的"判断。

但是,同化论与民族主义势力之间的此消彼长是一个复杂的动态演变过程,与梳理两者的动态变化相比,指出两者在"犹太种族"和"犹太性"上的立场更为容易。犹太复国主义者往往认同犹太性的种族指向,大量使用生物性和血缘性的修辞描述犹太民族,认为存在一个具有生物优越性的犹太种族,如约瑟夫·雅各布;同化论者则通过揭露"种族神话"的虚伪性而力图使这种叙事流产,后者认为宗教才是决定犹太人之为犹太人的核心,如伊思多赫·洛布和莫里斯·菲斯伯格。前者的反讽之处在于,不论是从关于犹太种族的知识谱系上,还是叙事方式或者修辞特征上,犹太复国主义者都毫无疑问与后来的纳粹处于表格的同一边,与同化论者针锋相对;而后者的吊诡就在于,坚持以宗教作为身份性核心的同化论知识分子却大多疏离于犹太教的生活方式。[②]

尽管犹太复国主义者更加认同犹太性的种族指向,但是他们也对犹太性的衡量标准进行了调校。例如,赫茨的儿子已经成为一名天主教徒,但他仍坚持认为通过"改宗"与"受洗",他"民族"的犹太性没有丁点儿损耗。而更加坚持"意第绪主义"(Yiddishism)的 Chaim Zhitlowsky 则对犹太性的定义更加宽泛,他给出了一个非常典型的日常情景:"有这么一个刚刚过世的人,在此之前他宣布想要埋葬在一个犹太墓地中,拉比却没有答应他。这是彻彻底底的野蛮,眼下野蛮的人操控着对死亡之权力。感谢上帝,他们手中紧握的权力,还没有延伸到此岸。在此岸的领域中,犹太人的民族同一性越来越将自己从宗教情感中解放出来而对一切信条观念敞开怀抱。"[③]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不论是同化论者,还是犹太复国主义者,都感到凭借犹太教所建立的身份话语是难以对其投入现代生活有任何助益,亦无法借以处理其在现代社会的价值危机。

① Maurice Goldstein,"The Jewish Racial Problem,"pp. 257,256.

② Mitchell B. Hart 为 *Jews and Race* 一书写的前言,Waltham:Brandeis University Press,2011,p. xxx.

③ Chain Zhitlowsky,"Jews and Jewishness,"pp. 150-152.

结　语

同一与差异、自身与他者、身份与话语，恐怕是现代性的一个一旦进入便难以走出的米诺斯迷宫。现代性的身份交往和管理逼迫着个人不得不坠入“身份之思”的深渊。一旦坠入，面对他者，人们就必须给出一个身份，交代清楚一个身份，乃至创造一种可被承认的身份，这些都是现代身份交往中的典型之举。新自由主义和历史终结的资本主义优胜论曾经缓和了这种身份的紧张性，但是在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重新抬头的时刻，种族论的幽灵就会阴魂不散：人们不是被作为个体的自己，而是被他所属的民族、所在的国家和他所具有物理特征定义自身身份。[①] 因此，在现代社会，尽管一种“白痴版本”的种族论已经成了过街老鼠，但是更加精妙版本的身份政治却大行其道。犹太人的种族论话语实践，其实质是参与身份交往，以此来面对甚至希图打消一种不可还原的恶意。这种恶意一旦达到临界值，就会不管不顾地吞噬一切说话者，包括它自己——这就是恶意的荒诞与可怕。

犹太知识分子通过复杂的知识谱系所建立的关于“犹太种族”的身份话语，不仅是源自种族论而且进一步推动了这种论话语的泛滥乃至失控。科学话语一方面给犹太人以问题最终解决的曙光，但另一方面科学知识学的话语并不存在客观性和主观性的修辞界限，这就使一种玩火自焚的危险始终潜藏在暗处。[②] 一切话语都有其修辞属性，科学话语不仅是一种客观性知识，更首先是一种话语。科学家具有知识的权威性，但我们应该承认其不具有话语的权威性。甄别、监督和反思话语的知识实践，应该可谓是人文科学研究的基本任务。

① 关于当前时代种族主义与身份管理的危险，请参见阿里亚娜·舍贝尔·达波洛尼亚的杰出研究：《种族主义的边界：身份认同、族群性与公民权》（钟震宇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 年版）。但是，当前中国很缺乏从新的历史形势下对种族论进行研究的学术作品，种族论往往被过度简化为一个“白痴版本”，但实际上种族论的狡猾和在知识学上的复杂需要我们严加警惕。（参见[法]皮埃尔-安德烈·塔吉耶夫：《种族主义源流》中“名称意味着什么？”一章，高凌翰译，三联书店 2005 年版，第 50～61 页）

② 从人类学、病理学、医学、生物学到纳粹的种族屠杀，不过是天堂地狱的一步之遥。犹太人的科学测量实践手段和学术产品，往往瞬间被反犹主义者所利用。参见[美]罗伯特·杰伊·利夫顿：《纳粹医生：医学屠杀与种族灭绝心理学》，王毅、刘伟译，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21～37 页。